

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朱培初  
编著



# 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朱培初 编著

轻工业出版社

## 内 容 介 绍

在我国陶瓷史上，对世界影响最广泛而深刻的就是明、清时期。明、清两代的陶瓷匠师们，世代相传，勤奋地创作和劳动，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建立了功勋。

本书作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明、清陶瓷和世界各国的交流以及中国陶瓷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这是一本具有历史和学术研究价值的编著，本书对工艺美术、陶瓷工作人员及历史研究人员、文物、外事、外贸工作者很有学习和参考价值，对广大工艺美术、历史、文物爱好者和社会读者也可从中得到不少收益和启发。

## 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朱培初 编著

\*

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路3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20/32 字数：193千字

1984年8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200 定价：1.40元

统一书号：15042·1847

## 目 录

一	《马可·波罗行纪》和瓷器贸易	1
二	郑和出使“西洋”和瓷器的交流	6
三	明代——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	13
四	清代景德镇瓷器及其名家	20
五	广州——“东方的伦敦”	29
六	葡萄牙——第一个从事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	34
七	寻找“黄金般”瓷器的西班牙	43
八	运载中国瓷器的荷兰舰队	48
九	法国路易王朝对中国瓷器的狂热爱好	58
十	英国伦敦的“瓷器人”	73
十一	首先生产真正瓷器的德国	87
十二	奥地利和意大利	97
十三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和清代瓷器	106
十四	欧洲其他国家	117
十五	历史悠久的“陶瓷之道”	127
十六	谦虚好学的日本陶瓷匠师	140
十七	朝鲜李氏王朝的青花瓷器	149
十八	“中国白”——福建德化瓷器	156
十九	苍古幽雅的青瓷	166
二十	淳朴雅致的宜兴紫砂陶器	175
二十一	欧洲的传教士、艺术家和中国瓷器	185
二十二	小结	197
	后记	205
	插图目录	206

## 《马可·波罗行纪》和瓷器贸易

1307年（元代大德十一年）8月，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 将他的著作《马可·波罗行纪》献给法国王子瓦罗埃斯(Valois) 伯爵后，成为轰动世界的名著。他在长达二百二十九章中所叙述的关于中国和东方各国的神奇而美丽的亲身经历，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欧洲的兴趣，甚至于说，对于欧洲到远东的新航路的发现也是起了一定的影响。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开拓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中国南海的新航路后，欧洲各国相继和中国直接进行了贸易。中国的瓷器，就是我们和欧洲各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所以，关于明、清陶瓷和世界的交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就从这里开始第一个篇章。

### “世界奇异之书”

1298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一场激烈的海战中，威尼斯的二十五艘军舰被热那亚所击毁，在军舰上的威尼斯士兵马可·波罗也被俘虏，被关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中达六年之久。由于马可·波罗曾经到过中国，并在中国仕官十七年，所以名声远扬，在监狱中得到了特别优厚的待遇。许多热那亚人常到监狱来拜访他，询问有关中国和东方的奇闻，这些新闻对欧洲人来说，简直是不能想像的。可能是马可·波罗对于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的询问非常厌烦，于是就将其旅行中国和东方的亲身经历口述，请同狱的文学家鲁思梯谦科(Rusticianco) 用法文笔记录下来。这一部《马可·波罗行纪》就是欧洲在中世纪称之为“世界奇异之书”。

四年以后，马可·波罗因为他的《行纪》而名扬欧洲，热那亚人不需要赎金，就把他释放，最后在1324年（元代泰定元年）逝世，享年七十岁。

大约在1323年初，当马可·波罗病危时，不少社会人士和亲友们认为他的《行纪》是对中国和东方国家故意的夸张和粉饰。因为当时对欧洲人来说，鞑靼人是野蛮而残忍的，而马可·波罗对元代皇帝、壮丽而灿烂的宫殿、美丽的瓷器和琉璃瓦、人口众多的繁华城市等等的描写，都似乎是虚构而不足取信的。所以，不少社会人士为了在马可·波罗临终前“拯救他的灵魂”，曾经多次哀求他否认这部著作，或者至少否认他们认为是简直不可能的“虚构”的部分。但是，奄奄一息的马可·波罗在临终前，还是郑重声明，他不仅没有言过其实，而且“所见的异事，还没有说到一半”！这一部在人类历史上不朽的著作，过了五百年，即在1824年，才出版了法文本。

## 马可·波罗和中国陶瓷

在《马可·波罗行纪》第一百五十四章，马可·波罗叙述他从杭州出发，经衢州，而到格里府（Quelifu），即今之福建建宁。他说，这个城市也甚广大，城中有三座石桥，“每桥长一哩，宽二十尺，皆用大理石建造，有柱，甚美丽”，是“世界最美之桥也”。建宁是宋代著名的陶瓷——建盏的产地，但是马可·波罗却疏忽地没有提及。后来，他到了福州，说这个对外贸易的商港也是“工商辐辏之所”，“此城美丽，布置既佳，凡生活必需之物皆饶，而价甚贱”。城内“有一大河，宽一哩，穿行此城。此城制糖甚多，而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盖有印度船舶数艘，常载不少贵重货物而来也”。

马可·波罗离开福州后，渡过河，骑行五天，到达了闻名世界的我国著名对外贸易商港——刺桐（Caiton）港，即泉州城。

他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蒞此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多）至不可思议”。他还看见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船舶，前来购买瓷器等货物，约有一百多艘，所以，元世祖“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泉州有不少人精于纹身的技术，所以也吸引不少印度的旅客专程前来“刺青”。此外，他还特别提到了德化瓷器。他说，泉州城附近有个生产瓷器的“迪云州（Tiunguy）”，即德化。这个城市“制造碗及瓷器，既美且多。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但是他没有亲自到达这个城市。他还听说，制造瓷器的方法是“先在石矿取一种土，曝之风雨、太阳之下三、四十年，其土在此时间内成为细土，然后可造上述器皿，上加以色，随意所欲，旋置窑中烧之”。这是欧洲人关于中国陶瓷制作方法的最早的记载。马可·波罗还说，泉州城中“瓷器市场甚多，威尼斯钱币一枚可以购买八个瓷盘”，他认为是非常便宜的。

和瓷器有关的，便是关于元代宫殿琉璃瓦的叙述。元代，我国琉璃瓦的制作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官府在少府监下设大都（今北京）窑场，“领匠夫三百余户，营造素白琉璃瓦”，在中统四年（1263），设立了琉璃局。在民间，山西的平阳、霍州（今霍县）、泽州（今晋城）、蒲州等地也烧造琉璃瓦，并以蒲州窑为最佳。马可·波罗在书中还描述元代大都的宫殿，“周围有一大方墙，宽广各有一哩，……此墙广大，高有十步”，特别是大明殿的“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

“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贍，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琉璃）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结构之坚，可以延存多年”。

## 马可·波罗的世家

马可·波罗在福建购买了不少瓷器，相传其中包括一只德化瓷器香炉，并且在1295年(元代元贞元年)带回到离别二十年的故乡——威尼斯。现在，这件德化瓷器香炉仍然珍藏在威尼斯，成为十三世纪时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附图一)。

马可·波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中世纪时代中西方贸易往来历史的反映。他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家庭。中世纪的威尼斯是欧洲和远东进行贸易的中心。欧洲的商人们都聚集在这里，和阿拉伯国家的商人们进行贸易，购买中国贵重的瓷器和丝绸。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斯(Nicolas)和叔父玛窦(Matteo)就是经营远东贸易的商人。他们俩在1260年从康斯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经由波斯(今伊朗)，来到我国。由于他们两位熟知鞑靼语，所以元世祖接见了他们，和他们直接谈话，“先询(欧洲各国)诸皇帝如何治理国土，如何断决狱讼，如何从事战争，如何处理庶务”以及“教皇、教会及罗马诸事并及拉丁人的一切风俗”。他们两位“贤智而博学，皆率直依次对答”。在尼古拉斯和玛窦回国前，元世祖委托他们给罗马教皇带去一封用鞑靼文写成的书信，要求教皇派遣一百名通晓文法、论理学、修辞学、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等七种文化和基督教律的专家、传教士们来中国。在1269年，他们才回到意大利，可能也带去不少元世祖送给的瓷器和其他珍贵礼物。这时，马可·波罗才十五岁。1275年(至元十二年)夏季，二十一岁的马可·波罗随其父亲、叔父到达我国上都(今内蒙多伦县西北四十公里)，得到元世祖的隆重接待。



## “马可·波罗阁下”在中国

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后，熟悉鞑靼的风俗和语言。西方学者们认为，当时元代宫廷内使用的语言，除了蒙古语外，还有汉语、波斯语和大夏（中亚细亚古国，今阿富汗北部）语等计六种。马可·波罗自称能说四种语言“以及他们的书法同他们的战术，精练至不可思议”，因而得到元世祖的宠爱，待遇优厚，先后在我国仕官十七年之久。元世祖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马可·波罗在“奉使归来，谒见大汗，详细报告其奉使之事，言其如何处理一切，复次详述其奉使中之见闻”，这使元世祖“及其左右闻之，咸惊异不已，皆说此青年人将必为博识大才之人”。从此以后，朝廷官吏们都尊敬地称他为“马可·波罗阁下”。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思恋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想归回意大利。但是，元世祖“爱之切，欲置之左右，不许其归”。后来，世祖将他的族女科格塔雷（Cogatra）“下嫁伊儿汗国（今伊朗和小亚细亚）国王阿鲁浑（元世祖的从孙）为妃”，由于马可·波罗“历涉印度海诸地，熟悉航道情形”，才允许马可·波罗他们偕使臣三人护送赐妃前往伊儿汗国后回到意大利。

## 二

# 郑和出使“西洋”和瓷器的交流

明朝从洪武元年（1368）到明成祖即位的永乐元年（1403）三十多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包括瓷器，特别是江西景德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商业资本也活跃起来。封建地主阶级不仅需要奇珍异宝来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同时也迫切要求扩大商业和对外贸易。明初，我国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地设置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且规定日本商舶进宁波港，琉球（今日本琉球群岛）等南洋诸国进泉州港，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及西洋诸国进广州港。永乐三年（1405），因为对外贸易的繁荣以及外国来朝贡的使节、商人日益增多，诏令在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浙江宁波等三市舶司置驿，广东名“怀远”，福建名“来远”，浙江名“安远”，以便安置和款待外宾。同年，又出现了世界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郑和出使“西洋”。

## 郑和及其侍臣

永乐初，成祖敕遣重要使臣出使“西洋”诸国。三保太监郑和便是派遣的使臣之一。郑和，本姓马，回族人，原籍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昆阳县）人，信奉回教，后被阉纳入宫廷。永乐初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他的祖父马拜颜、祖母马氏、父亲马哈只、母亲温氏，都是回族人。父亲马哈只，身材“魁岸奇伟”，“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赈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母亲温氏，“有妇德”，生有子二人、

女四人，郑和是次子，兄长名文铭。郑和“自幼有材志”，在宫内任内官监太监时，“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勩，缙绅咸称誉焉”（见《永乐三年李至刚撰故马（哈只）公墓志铭》）。郑和在京任职期间，仍然对双亲和乡里极为怀念，永乐九年（1411）十一月，曾奉命远道回家，祭扫父亲坟墓。

郑和担任出使“西洋”如此重任，是和他出身于回族家庭分不开的。自唐、宋以来，印度和南洋的商业、对外贸易大多为信奉回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们所垄断。这样，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出使“西洋”的重任也就自然落到朝廷内有较高威信的郑和身上了。

在郑和出使“西洋”的侍臣中，担任翻译的哈三、马欢等也是回教徒。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精通阿拉伯文，职为通事，即翻译，是《瀛涯胜览》的作者。他在郑和的领导下，“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于是摭采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以及“土产之别、疆域之制”，于永乐十四年（1416）将所见所闻写成《瀛涯胜览》。除了马欢外，江苏太仓人费信，字公晓，在永乐至宣德年间也曾“四次随从正使太监郑和等至诸海外，历览诸番人物风土所产”，时间长达二十余年，于正统元年（1436）“图写成帙，名曰《星槎胜览》”。此外，南京的巩珍也随同郑和“往返三年”，“涉历遐方，覩斯胜概，诚为千载之奇遇”。于是，“凡所纪各国之事迹，或目及耳闻，或在处询访，汉言番语，悉凭通事转译而得，记录无遗”，在宣德九年（1434）写成《西洋番国志》。

## 出使“西洋”和瓷器的交流

郑和出使“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六月起，到宣德八年（1433）七月止，前后共七次，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到达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古里（今印度）、满刺加（今马来亚）、苏

门答拉（今苏门答腊）、锡兰山（今斯里兰卡）以及天方（今沙特阿拉伯）和木骨都束（今非洲东海岸）等三十多个国家。关于这七次远航的具体时间，中外学者们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但仍然意见纷纭。

郑和出使“西洋”的规模，在世界交通史上也是空前的。《明史》和《星槎胜览》说，永乐年间，“郑和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一说三万六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一说六十三艘）”，随从的官员八百六十八名、军士二万六千八百名（包括水手）、指挥九十三名、医官和医士一百八十名等。他们在每次出使前，都准备了大量的瓷器、麝香、丝绸等，在到达海外诸国时，或作为礼品赠送，或作为商品贸易，使中国的瓷器广泛地流传到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

《瀛涯胜览》在祖法几国（今阿拉伯半岛南端）中记载道：“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纒丝、瓷器等物。”在占城，也记载其国的贸易中流通七成淡金来交换“中国青瓷（的）盘、碗等品、纒丝、绫绢”等。爪哇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用“铜钱买易”。锡兰山国也最喜爱“中国麝香、纒丝、色绢、青瓷盘碗”等，“则将宝石、珍珠换易。”

《西洋番国志》也同样记载了占城国以七成色淡金交易“所喜者中国青瓷盘、碗等器”；爪哇国人“最喜青花瓷器，并麝香、花绣、纒丝”等货；锡兰山国也“爱中国麝香、纒丝、色绢、青瓷盘碗”等，“以宝石、珍珠易换”。

总之，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这三部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瓷器已经广泛地流传到刺撒（今波斯湾附近）、榜葛刺（今印度恒河入口处）、琉球、苏禄和三岛（今菲律宾）、大唎南（印度）、阿丹（今也门）、竹步（今非洲东海岸）、三佛齐（今印尼）、满刺加（今马六甲）、苏门答腊、

龙牙犀角（今马来亚半岛）、锡兰山、柯枝（今印度柯钦）、古里（今印度）、忽鲁谟斯（今伊朗阿曼湾北岸）等约二十个国家。

这三部史籍都提到了天方国（一名默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附近）的情况，说中国海舶到那里，往返需要一年的时间。麦加的礼拜寺有四百六十六门，四百六十七根白玉柱，寺庙以五色石叠砌而成，寺内栋梁为五根大沉香木，“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墙上用皂纒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门”。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地的回教信徒都远道来礼拜，皆将所罩纒丝，割取一块，作为纪念，“剝割既尽，其王预织罩之仍复，年年不绝”。这个《天方夜谭》里所描绘的神奇而美丽的国家，也喜爱中国的瓷器和麝香。

法国著名学者费朗在《苏门答腊古国考》中引证了1789年和1848年西方出版的史籍指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当时是中西贸易的主要商港。西洋商贾欲至中国贸易者，在明初“仅能达于斯国。此外，中国诸地，因路途（远）而宗教异，皆不能至”。于是，中国商舶运来大批的瓷器、樟脑、香油等，通过爪哇，再由西洋商贾转售西方各国。

## 苏泥、勃青和胭脂石

特别应该指出，郑和出使“西洋”，耗费甚多，但据《明史·郑和传》记载，船舶归来，“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瀛涯胜览·纪行诗》也提到：“归到京华覩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郑和所带回中国的宝物，大多是犀牛角、象牙、香料、玳瑁、翠毛、苏木，甚至还有能言语、会唱歌的鸚鵡等。但是，在中国陶瓷史上最应该提及的则是苏泥、勃青和胭脂石、紫碁等色料。

吴仁敬等在1935年所著的《中国陶瓷史》指出，明代瓷器描绘所用的色料，“多采自外国，如青花初用苏泥、勃青。至成化

时，因苏泥、勃青用尽，乃用回青。红色，则有三佛齐之紫砒，渤泥之紫矿、胭脂石”。由此可见，郑和出使东南亚国家，从苏门答腊岛、槟榔岛带回的苏泥、勃青以及从苏门答腊岛、文莱带回的紫砒，胭脂石等色料，对明代的瓷器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

苏泥和勃青（一说苏泥勃青）是含钴的色料，《景德镇陶录》称为苏麻离青，用于青花瓷器描绘。青花，是先在白瓷胎上以深浅不同的青色描绘纹样，然后上白釉罩之，入窑烧制而成，因为青色在釉下，所以朝鲜又称为釉里青。相传在宣德年间，因为使用东南亚国家的苏泥、勃青，所以花纹深入釉骨，所生产的青花瓷器以淡彩、润泽有光者为贵。（附图二）成化年间，因为苏泥、勃青使用完竭，改为从云南进口来的回青，将它捶碎，在水中澄定后，可得真青，价倍黄金，所烧造的青花瓷器却以深色为贵。云南的回青，又称回回青、佛头青，可能起初是从伊斯兰回教国家进口的，所以称为回青。后来，在正德年间，在我国云南临安（今建水）也发现了类似的矿石，称为天青、大青。此外，《明会典》记载，苏门答腊等国还继续向我国献上回青、回回青。但是，无论是从东南亚、阿拉伯国家进口，或者是云南所出产的大青，都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到了清代，据《南窑笔记》等记载，在江西的瑞州（今高要、宜丰、上高等县）和乐平以及浙江、广东、广西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色料，称为陂青、石子青、霁青、东青、陂塘青、敲青等。同时，清代《户部则例》记载福建海关的关税品目中有大青、碗青，估计可能仍然是东南亚国家进口的苏泥、勃青。

在世界陶瓷艺术中，我国青花瓷器是珍贵的艺术遗产。所以，不少学者对青花色料进行了研究。在明代，青花色料也引起了注意。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优质）亦名佛头青”，它是一种色料，用最好的釉料调和之，呈现黑色，“入火则成青碧色”，入窑经过高温烧造，才能呈现青碧色，“非大青能入洪炉（而）存本色也”，并不是大青这种色料入窑

烧后，还能保持本来的蓝色，从而纠正了以往误认为回青是一种釉料的说法。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说：“今之石膏，绘画家用之。其色青翠不渝，俗呼为大青。楚、蜀诸处亦有之。而今货石膏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佛头青，种种不同，而回青尤贵”，也说西域国家输入的回青是最贵重的色料。

不少日本学者考证说，《景德镇陶录》所称的青花为苏麻离青，它可能是斯玛尔图姆（Smaltum）的译音。斯玛尔图姆是中亚国家的一种色料，在唐代，中亚国家便有了青釉。我国唐代的“唐三彩”瓷器中的青釉，也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中亚国家学来的。到十三世纪，蒙古占领了中亚、西南亚的地区，并在蒙古宪宗八年（1258）占领了巴格达，后来又建立了伊儿汗王国（今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和中亚阿姆河西南地区）。在侵略战争中，蒙古得到了大批俘虏，并且把其中的优秀匠师送回后方。例如，在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就有俄国的金匠、银匠。因此，在元代，通过来到我国的中亚国家匠师以及和中亚等国的贸易，我国也学习了阿拉伯国家青花色料和青釉的技法。此外，在元代的青花瓷器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附属装饰的阿拉伯图案，很明显，这也是受了阿拉伯国家的影响。

## 经营瓷器的明代富商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大多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出发，一个月后到福建长乐停泊，并于福建五虎门驶入南海，张十二帆，如果顺风，十昼夜就可到占城，然后沿印度支那半岛海岸，到达最南端的马六甲。从马六甲分为两条航线，一条到苏门答腊、爪哇；一条经由巽他海峡，到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又西行，到阿曼湾、红海口和非洲东岸。

在明代，除了郑和出使的宝船外，福建、广东的商舶也经常航行在驶往东南亚和印度的航线上。特别在明末，福建的郑芝龙

兄弟更是闻名世界的富商，他们拥有成百艘商舶，成千名人员，到景德镇、江苏等地采购瓷器和织锦，其贸易的商舶到达日本、印尼、印度等国，资金之巨，无法揣测。明代张燮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所著的《东西洋考》也说，商人李锦、潘秀、郭震等人，经常往返于大泥（今泰国南部）和我国之间，专门和荷兰进行贸易。在这些私人贸易活动中，瓷器、生丝、茶叶等也都是主要的商品。

无论是郑和的宝船，或是广东、福建富商们的商舶，能够远航在南海、印度洋，经历惊涛骇浪，航期最长达两年多，这说明当时造船业的技术已经相当进步。



### 三

## 明代——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陶瓷史上，继宋代以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就是明代。明代的青花、霁红、五彩、斗彩等都是闻名于世的瓷器，它广泛流行到欧洲、日本等国，对世界陶瓷艺术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制作技艺上，全国绝大多数瓷器已经完全由半瓷半陶的阶段过渡到真正的瓷器，瓷质细腻，釉色精美，彩绘的艺术也非常高明，这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即使在现在，这些远在五百年前的卓越艺术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 明代的景德镇御窑厂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烧造，有着悠久的历史。《景德镇陶录》说，这一世界著名的瓷都原“属浮梁（县）的兴西乡，去城二十五里，（因为）在昌江之南，故称昌南镇。（镇）自观音阁、（江南）雄阁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十三里，故又有陶阳十三里之称”。早在南北朝时，至德元年（583），陈后主诏景德镇以陶瓷器进贡建康（今南京）。唐代武德年间（618—626），昌南镇有位陶瓷匠师把瓷器运载到京都长安，受到人们的称赞，被称誉为假玉器，并且还进贡朝廷，从此昌南镇瓷器名扬天下，而这位匠师的姓名也就流传为陶玉。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昌南镇的瓷器深得宋真宗的喜爱。真宗命令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个字，“其器尤（为）光致茂美”，当时风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镇的名字也就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了。但是，在宋代，由于汝窑（今河南临汝）、官窑（今河南开封）、浙